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附录 1：对应于正文第 11 页脚注①

国家级开发区和撤县设区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具体分布

图 A—1 呈现国家级开发区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具体如下：①1990 年之前，属于在高等级城市和沿海城市“先试点，后发展”阶段。自 1984 年国家先后设立 5 个经济特区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1984 年到 1990 年设立 16 个国家级经开区；1988 年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在北京设立。这些开发区中 5 个位于直辖市、2 个位于省会城市、其余 9 个位于沿海开放城市。这期间国家级开发区主要位于高等级城市和沿海城市。②1990—2005 年，属于在全国高等级城市逐步“展开”阶段。鉴于经济特区等开放政策初见成效，1992 年国家实施新一轮改革开放，如设立上海浦东新区、增设一批国家级开发区等。1991 年至 2000 年，设立 52 个国家级高新区：2 个位于直辖市、27 个位于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22 个位于非省会城市；设立 32 个国家级经开区：21 个位于直辖市、副省级或省会城市。简言之，这期间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分布于高等级城市和沿海城市，少数设立于洛阳、大庆、绵阳等中西部地级城市。③2006—2010 年，属于向有条件的地（县）级城市扩容阶段。随着经济基础的积累，国家开始注重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级开发区开始向有条件的地（县）级城市扩容。这期间国家设立 30 个国家级高新区，其中 28 个位于非高等级城市；设立 70 个国家级经开区，其中 52 个位于非高等级城市；另外，在新疆喀什设立 1 个经济特区。简言之，国家级开发区由高等级城市向中低等级城市扩散，特别是向地级城市扩散。④2011—2015 年，属于区域均衡与创新引领并重发展阶段。在均衡发展战略上，国家级开发区更多设立在非中心城市，如设立的 73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低等级城市占 70 个；设立的 101 个国家级经开区，中低等级城市占 83 个。截至 2015 年末，有一定发展条件的地级城市和发展条件好的沿海县级城市多设立了国家级开发区。另一方面，国家对高等级城市发展模式有更高的要求，实施创新引领战略，如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16 个国家级新区，其中 12 个位于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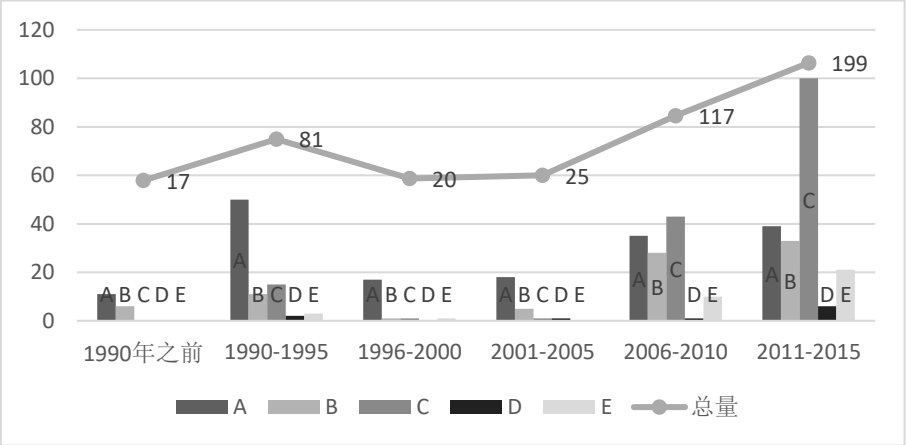

图 A—1　1984—2015 年国家级开发区在不同类型城市分布的对比图

注：A、B、C、D、E 分别代表高等级城市、沿海地级城市、内陆地级城市、沿海县级城市、内陆县级城市，下同。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统计范围主要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经开区和国家级高新区。

图 A—2 综合撤县设区、撤地设市和撤县设市三类行政区划调整，并以撤县设区为主的空间分布特征如下：①1995 年之前，行政区划变动频繁阶段。从 1978 年到 1995 年，城镇

化战略重点是发展中小城市：大规模撤县设市，使县级市从 91 个增至 350 个左右；同时，将原先的地级行署（地区）调整为新设地级城市，使地级城市数从 84 个增至 267 个。当然，这期间对高等级城市的撤县设区也有一定的支持。图 A—2 中 1990—1995 年行政区划的变动为 247 个，撤县设市数为 71 个、新设地级城市和撤县设区数为 136 个、高等级城市的撤县设区数为 40 个。这个阶段可认为是支持中小城市为主、兼顾高等级城市的土地供给政策。②1996—2005 年，主要为撤县设区阶段。鉴于前期的撤县设市政策未能有效地推进小城市发展，自 1998 年国家转向撤县设区支持大中型城市发展。图 A—2 显示这期间撤县设区的总数在 238 个；其中，高等级城市撤县设区达到 64 个（平均撤县设区数近 2 个），而地级城市撤县设区数在 164 个（平均撤县设区数小于 1）。③2006—2010 年，行政区划变动缓慢阶段。由于前期的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许多城市出现土地城镇化速度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引起国家关于土地资源浪费的担忧，这期间的行政区划变动几乎停滞（图 A—2 中的新增数只有 21 个）。④2011—2015 年，大中型城市的撤县设区再度兴起阶段。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同时地方政府平台债的增加，地方政府对土地有迫切的需求。撤县设区再度兴起，特别是高等级城市的撤县设区频繁，如图 A—2 中高等级城市撤县设区数达到 28 个，地级城市撤县设区在 60 个左右。⑤卢盛峰等（2017）认为 1994—2015 年间全国撤县设区有以下特征：共计有 259 个县市完成撤县设区，实施政策的县市约占县市总数的 12%；其中 2000 年之后撤县设区数占比超过 60%，大约为 156 个；从地理空间分布角度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致呈现均衡状态且东部占比超过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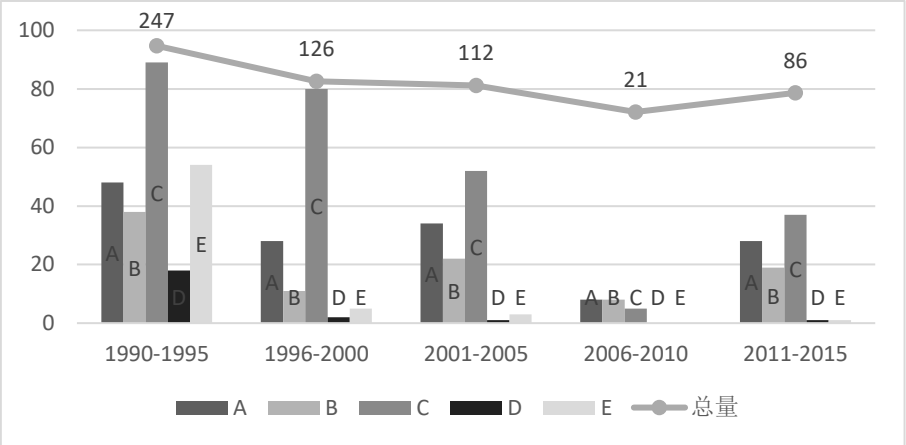

图 A—2　1990—2015 年行政区划变动在不同类型城市分布的对比图

数据来源："中国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org/)。统计范围为 1990—2016 年国务院与民政部批准公布的区划调整情况；其中，地级以上行政等级城市主要统计新增撤县设区、撤地（地区）设市的调整数量，县级市主要统计新增撤县设（县级）市的调整数量。

附录 2：对应于正文第 15 页脚注②

PSM 匹配结果及比较

鉴于城市之间存在异质性，需要为处理组城市寻找尽可能相似的对照组个体，本文选择城市行政等级（地级城市为 1，县级城市为 0）、沿海或内陆的地理区位（沿海设为 1，内陆设为 0）、城市规模（人口数的对数值）三个指标进行匹配，采用 PSM 法构造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计算每个城市样本进入处理组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值。在总对照组中选择与处理组具有相同或相似倾向得分值的样本，作为处理组的对照组，使处理组与对照组满足共同趋势假设。由于干预城市的发展政策是跨期在多个城市实施的，因此采用逐年基期匹配的方法（张清源等，2018），即在潜在的对照组城市为每一期干预政策的处理组城市寻找匹配个体。

在 PSM 匹配过程中，本文对每一个进入处理组的城市寻找到多个对照组，并根据总匹配次数进行相应调整。关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匹配效果，本文绘制了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图 A—3 显示，在倾向得分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非均衡，两组样本倾向得分值的概率密度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之间存在选择偏差。图 A—4 显示，在完成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核密度曲线很相近，保留下来的两组样本概率密度分布明显比匹配前趋于均衡，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别下降明显，表明匹配后两组样本城市的主要特征较接近，样本的选择性误差得到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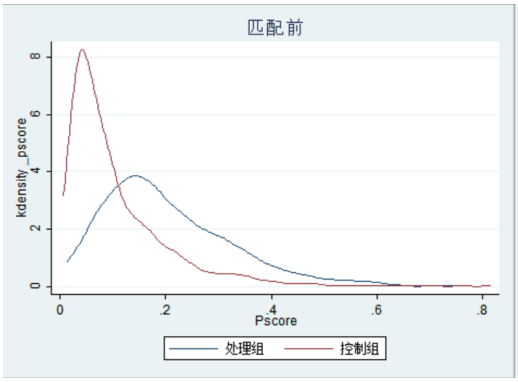

图 A—3　匹配前倾向得分的核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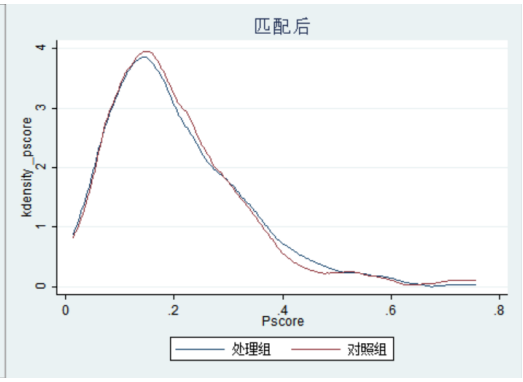

图 A—4　匹配后倾向得分的核密度

附录 3：作为正文第 15 页倒数第二段内容

（国家级开发区关键变量的影响）的补充

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果的时空差异

借鉴张学良等（2017）的计量方法，本文评估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效果的时空差异。正文部分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呈现计量结果，此处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如下：①考察政策效果的空间效应差异。前文关于国家级开发区现状特征表明，高等级城市都拥有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优势，而中低等级城市只有部分城市拥有这一政策优势。按照 Bartik（1991）的观点：某一优惠政策会导致空间竞争或垄断的影响。因此本文检验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在不同等级城市效果的差异。②考察政策效果的时间效应差异。一方面，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这一政策优势对城市规模影响是否存在持续性？另一方面，不同时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如 2005 年之前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分布于高等级城市和沿海城市，而 2006 年之后逐步向内陆城市倾斜，不同时点国家级开发区设置的目标和标准存在差异。不同城市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等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的时间效应差异。

（1）政策效果的空间效应差异。为考察政策效果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影响差异，本文在 PSM-DID 模型中，采用未处理的全样本进行检验，即在基准回归样本城市的基础上添加高等级城市，由此得到高等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共 423 个城市 5 期样本数据。同时，在基准回归项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处理虚拟变量 $CXSQ_{it}\times City_{it}$ 与城市行政等级虚拟变量 $XZDJ_i$（若某城市为地级市或者县级市为 1，否则为 0）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A—1 右半部所示：在加入高等级城市样本后，政策处理虚拟变量的系数（β_1）不再显著，但是政策处理虚拟变量与行政等级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 $City_{it}\times Year_{it}\times XZDJ_i$ 显著为正，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对于高等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获批国家级开发区的效果更明显，更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张，更能够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以江苏南部的昆山、张家港和常熟为例，2000—2010 年城市常住人口分别从 43.44 万、43.23 万和 56.52 万增长到 111.86 万、76.26

万和 92.91 万（李松林和刘修岩，2017）。这些县级城市规模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较早批设国家级开发区而长期得到经济导向政策的政府偏爱有关。

（2）政策效果的时间效应差异。①对应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时段特征，本文分 1991—2005 年及 2006—2015 年两个时段计量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A—1 的右半部分所示：一方面，两个时间段的政策效果系数 β_1 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尽管时点不同但都显著提高城市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1991—2005 年的回归系数 β_1 为 0.0820，显著高于 2006—2015 年对应的系数值（0.0634），说明前期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的效果优于后期，这可能是前期“靓女先嫁”而后期注重区域均衡发展而导致的。②为检验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果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还分 1991—2005 年、2006—2010 年和 2011—2015 年 3 个时间窗口（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对应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时段特征是分期集中设立，而非连续均匀设立），设置时间趋势虚拟变量（即将某个城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第 j 年设为 1，其他设为 0），以此检验“政策”实施第 j 年的影响。结果如表 A—1 右半部所示：无论是在 1991—2005 年时间段还是 2006—2015 年时间段，政策的时间趋势虚拟变量均显著为正，从而表明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随时间的推移一直存在。但另一方面，系数呈现下降的趋势且显著性也有所降低，这意味着国家级开发区对城市规模增长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表 A—1：基于 PSM-DID 模型政策效果的时空差异

变量	空间效应	1991—2005 年		2006—2015 年	
		（1）	（2）	（1）	（2）
$City_{it}\times Year_{it}$	-0.0130	0.0820***		0.0634***	
（β_1）	(-0.83)	(3.62)		(5.31)	
$CXSQ_{it}$	0.0174***	0.0005		0.0281*	
（β_2）	(3.47)	(0.08)		(1.82)	
$CXSQ_{it}\times City_{it}$	0.0290*	0.0582**		0.0192**	
$\times Year_{it}$（β_3）	(1.91)	(2.19)		(2.00)	
$City_{it}\times Year_{it}$	0.0859***				
$\times XZDJ_i$	(4.92)				
$T_{1991\text{-}2005}$			0.1316***		0.0746***
			(6.24)		(6.41)
$T_{2006\text{-}2010}$			0.0772***		0.0325**
			(2.97)		(1.87)
$T_{2011\text{-}2015}$			0.0630*		
			(1.63)		
市场潜力	0.0425***	0.0526***	0.0549***	0.0289**	0.0216
（$\ln MP_{it}$）	(5.95)	(4.73)	(4.96)	(2.04)	(1.51)
产业结构	0.0242***	0.0520***	0.0525***	0.0401***	0.0435***
（S_{it}/M_{it}）	(2.47)	(3.66)	(3.71)	(2.44)	(2.62)
初始规模	-0.3783***	-0.5016***	-0.5167***	-0.6444***	-0.6548***
（$\ln S_{it}$）	(-24.88)	(-23.82)	(-23.98)	(-13.82)	(-13.46)
$\ln S_{it}\times t$	0.0162***		0.0216***		0.0123***
	(2.94)		(4.81)		(4.73)
$\ln S_{it}\times t^2$	-0.0024	0.0092***	-0.0027**		
	(-1.20)	(6.13)	(-2.53)		
$\ln S_{it}\times t^3$	0.0001	-0.0020***		0.0014***	
	(0.58)	(-4.72)		(3.9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8783***	3.4660***	3.4724***	4.7285***	4.753***
	(34.63)	（29.19）	(29.67)	（15.13）	(15.03)
N	2115	1137	1137	758	758
R^2	0.35	0.51	0.52	0.46	0.45

附录 4：对应于正文第 16 页脚注①

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仅呈现不同地理区位城市的异质性。这里补充前文的稳健性检验，

具体为：被解释变量的指标替代、不同等级城市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及国家级开发区作为产业导向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1）不同方法测算人口增长率的异质性检验。鉴于本文选择城市人口相对（全国）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不同于 Eeckhout（2004）的标准化增长率。为此，分别用城市人口实际增长率和标准化增长率来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A—2 第 2—3 列，可发现：以实际增长率为指标的回归结果与正文第 17 页表 3 第 4 列的结果类似，国家级开发区及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以标准化增长率为指标的回归结果与正文第 17 页表 3 第 4 列的回归结果略有差异，国家级开发区的系数较大但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标准化增长率加大了样本的方差，使系数波动较大。总体上，本文以城市人口相对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是较稳健的。

（2）关于不同等级城市的异质性检验。在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不仅代表着政治权力，还隐含着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等差异，同样政策的政府偏爱对不同等级城市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在选取样本时，本文考虑到除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之外，一些沿海城市同样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经济优势不输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等，如江苏省的苏州、南通，山东省的烟台等，因此，在正文的高等级城市样本基础上加入发展条件优越的沿海城市进行计量检验。表 A—2 的中间 3 列，按城市行政等级分类的回归结果表明：①对于高等级城市，单一的国家级开发区或撤县设区的效果不明显，可能是这些城市初始规模很大，单一政策刺激的效果不足以显著增加城市规模，只有这两种政策的交互作用才有显著效果。事实上，许多高等级城市同时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和撤县设区，打造有活力的新城区，如郑州的郑东新区。②对于中等级城市，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或撤县设区的效果明显而两者的交互项效果不明显。撤县设区会机械地增加城市人口，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有助于产业驱动城市规模增长；两者的交互项效果不明显，主要是这类城市极少同时获得这两项支持。③对于低等级城市，撤县设区的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几乎都已撤县设市，而只有少数城市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所以一旦设立则效果非常明显，系数高达 0.2138。④市场潜力的系数在各等级城市显著有效，是影响城市规模增长的重要变量，且该系数和国家级开发区与撤县设区交互项系数（β_3）的有效性同步，进一步说明市场区位决定着政府偏爱的效果。⑤产业结构的系数在低等级城市显著为负。随着制造业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小城市的产业结构会出现制造业比重高于服务业比重的情形，所以这与实际相符、“是非而是”的。

（3）国家级开发区作为产业导向政策的稳健性检验。在评估产业导向政策时，本文选择国家级开发区为指标，但事实上国家级开发区仅是产业导向政策的一种而不是唯一手段。因此在估计国家级开发区的影响时可能会忽略其它政策的影响，使回归结果高估。事实上，在实验期许多城市设立省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在优惠政策、产业规模等方面不如国家级开发区，却是对国家级开发区的补充；若仅评估国家级开发区，其政策效果可能被高估。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是否设立省级开发区的虚拟变量，如果设立则为 1，否则为 0。如果加入该虚拟变量后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果不显著，则表明本文估计的政策影响是不存在的；如果加入虚拟变量后，政策效果系数显著但变小，则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高估，只是这一高估并不影响结论。表 A—2 的最右列呈现加入省级开发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可发现：国家级开发区的系数 β_1 为 0.0419，统计有效但数值明显降低，说明仅用国家级开发区表示产业导向政策的效果会被高估；对于省级开发区，其回归系数为 0.0264 且统计有效，说明设立省级开发区是产业导向政策的有效手段。这有助于解释国家级开发区在中西部城市回归结果中不显著的原因，因为中西部城市省级开发区较多而回归时仅考虑国家级开发区的影响。

表 A—2：国家级开发区对城市规模增长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不同方法测算增长率		城市等级分类			省级开发区虚拟变量
	实际增长率	标准化增长率	高等级城市	地级城市	县级城市	
$City_{it} \times Year_{it}$（$\beta_1$）	0.0653*** (2.48)	0.3111** （2.31）	-0.0076 (-0.47)	0.0389*** (4.06)	0.2138*** (8.52)	0.0419** (1.88)

$CXSQ_{it}$	-0.0021	0.0198	-0.0030	0.0273***	0.0168	0.0018
（β_2）	(-0.09)	（0.17）	(-0.40)	(4.93)	（0.93）	(0.09)
$CXSQ_{it}\times City_{it}$	0.0903**	0.3468	0.0585***	0.0025	0.0431	0.0794**
$\times Year_{it}$	(1.83)	（1.37）	(2.85)	(0.26)	（0.78）	(1.94)
（β_3）						
市场潜力	0.2520***	1.0371***	0.0704***	0.0313***	0.0200*	0.2174***
（$\ln MP_{it}$）	(4.95)	（3.97）	(2.52)	(4.00)	（1.78）	(5.16)
产业结构	0.0881**	0.2842	0.0292***	0.0270***	-0.0347**	0.0950**
（S_{it}/M_{it}）	(1.80)	(1.13)	(2.44)	(2.34)	(-1.72)	(2.30)
初始规模	-0.2633***	-0.7870***	-0.5940***	-0.2634***	-0.5028***	-0.1748***
（$\ln S_{it}$）	(-4.18)	（-2.43）	(-13.54)	(-13.84)	(-14.49)	(-3.33)
$\ln S_{it}\times t$	0.0067	0.0822	0.0134	0.0121**	0.0403***	0.0015
	(0.28)	(0.68)	(1.24)	(1.93)	(3.15)	(0.07)
$\ln S_{it}\times t^2$	-0.0065	-0.0439	-0.0008	-0.0009	-0.0082**	-0.0035
	(0.77)	(-1.02)	(-0.20)	(-0.41)	(-1.83)	(-0.48)
$\ln S_{it}\times t^3$	0.0004	0.0031	-0.0000	-0.0001	0.0007	0.0001
	(0.50)	(0.69)	(-0.09)	(-0.21)	(1.43)	(0.18)
省级开发区虚拟变量						0.0264***
						(2.79)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6175***	-0.3360	4.9172***	2.2537***	3.3721***	1.0059***
	（1.51）	（-0.16）	(15.92)	(21.18)	（20.69）	(2.92)
N	419	419	250	1075	790	419
R^2	0.27	0.17	0.58	0.27	0.43	0.32

注：1995 年前高等级城市基本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或撤县设区，这里考察 1995—2010 年增量数的政策效果。

附录 5：对应于正文第 16 页脚注①

撤县设区政策的稳健性检验及其解释

本文从撤县设区政策类型、政策实施不同时段两个角度对撤县设区政策有效性进行稳健性检验，正文部分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呈现，结果具体如下：

①卢盛峰等（2017）认为从政府的批准目标角度，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可分为主动推进型与被动调整型两类；其中，前一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更大。为此，本文区分主动型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和被动型撤地设市样本分别回归，结果如表 A—3 左侧第 2—3 列所示：主动推动型的政策效果系数（$CXSQ_{it}\times Year_{it}$ 项系数）显著为正，而被动调整型的政策效果显著性明显降低；同时，交互项的系数（$CXSQ_{it}\times KFQ_{it}\times Year_{it}$ 项系数）在主动推动型城市组显著为正，而在被动实施型城市组不显著，因此主动推动型的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政策能发挥产业—土地的协同效果，有助于城市规模增长。②附录 1 图 A—2 显示，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呈间断性特征，且 60%以上的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在 2000 年之前完成。为检验不同时段的政策效果是否有差别，本文分 1991—2000 年和 2001—2015 年两个时段计量检验。结果如表 A—3 第 4—5 列所示：1991—2000 年时段的政策效果是显著的，而 2001—2015 年政策效果不显著。前者解释如下：许多沿海的县级城市，撤县设市已从早期被动调整型向主动适应型演进，故而效果较明显；后者可解释为：2000 年后相当一部分内陆城市的撤县设区依然属于土地和户籍人口的被动调整模式，故而效果不明显。③控制变量中，市场潜力、初始规模的影响都一致显著有效；产业结构的影响略有差异，如产业结构变量对县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不显著，与这些城市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现状是吻合的。

表 A—3：撤县设区对城市规模增长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政策实施类型		不同时段	
	主动推动	被动实施	1991-2000	2001-2015
$CXSQ_{it}\times Year_{it}$	0.0486***	0.0312*	0.1049***	0.0206
	(4.15)	(1.82)	(6.66)	(1.35)
KFQ_{it}	0.0656***	0.0396**	-0.0028	0.0536***
	(7.54)	(2.10)	(-0.08)	(7.80)

$CXSQ_{it}\times KFQ_{it}\times Year_{it}$	0.0458*	-0.0066	0.0031	0.0007
	(1.90)	(-0.20)	(0.14)	(0.08)
市场潜力（$\ln MP_{it}$）	0.0155**	0.0373***	0.0879***	0.0582***
	(3.05)	(3.60)	(4.33)	(4.57)
产业结构（S_{it}/M_{it}）	0.0226*	0.0976***	0.0592***	0.0241**
	(2.68)	(4.54)	(2.57)	(1.96)
初始规模（$\ln S_{it}$）	-0.3665***	-0.2853***	-0.3059***	-0.2659***
	(-21.13)	(-5.19)	(-8.38)	(-8.92)
$\ln S_{it}\times t$	0.0105	0.0310**		
	(1.49)	(1.88)		
$\ln S_{it}\times t^2$	-0.0002	-0.0083		0.0020
	(-0.07)	(-1.40)		(1.49)
$\ln S_{it}\times t^3$	-0.0001	0.0008	-0.0000	-0.0006**
	(-0.21)	(1.17)	(-0.07)	(-1.94)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9084***	2.1722***	2.2931***	2.2463***
	(32.25)	(8.12)	(11.07)	(11.94)
N	1570	325	758	1137
R^2	0.35	0.26	0.30	0.20

参考文献

[1] 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 政府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实证检验[J]. 经济学季刊，2017(4): 1563-1582.

[2] 李松林，刘修岩. 中国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扁平化:多维区域验证与经济解释[J]. 世界经济，2017 (11):144-169.

[3] 卢盛峰，陈思霞，张东杰.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吗[J]. 统计研究, 2017, (5):59-68.

[4] Bartik, T. J. Who Benefits from Stat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M]. Kalamazoo, MI: Upjohn Institute, 1991.

注：该附录是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组成部分，同样视为作者公开发表的内容。如研究中使用该附录中的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

引用示例:

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 朱军. 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2017,(1):5-24.

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中国工业经济》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朱军（2017），参见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下载。